

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

陈望道传略

邓明以



陈望道同志原名参一、融，笔名佛突、雪帆、晓风等，浙江义乌人，生于一八九〇年（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夏历十二月初九日，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语言学家，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

陈望道同志出生在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六岁入学，一直到十六岁，就读于故乡分水塘村的私塾，并在课余参加农业劳动，过着半农半读的生活。时值清朝末年，他目睹朝廷的昏庸腐败，痛感国困民贫的现实，开始产生了“实业救国”的幻想。他不满足于旧的传统的教育方式，渴望获得新的科学知识，于是就在一九〇六年离开农村，来到义乌县城，进县立绣湖书院，学习数学和博物。次年，他又回到分水塘农村，团结了当地的一些激进青年，一起毁寺兴学。因为那时“他意识到要使国家强盛起来，首先要破除迷信和开发民智”^①。一九〇八年，他又离开农村来到金华中学，发奋攻读自然科

学。在金华中学四年肄业，成绩优异。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于一九一五年年初赴日本留学。在留日期间，先后进了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同时还在日本的物理夜校学习。四年之间，他以超人的毅力学习了物理、数学、法律、经济，以及哲学、文学等学科，最后毕业于中央大学法科，得法学士学位。

在日本留学时期，他还积极投入当时的各项政治活动。他自己曾说“有鉴于辛亥革命的失败，因此非常关心当时的政治”。②激于爱国热忱，他“在日本与留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以及反对洪宪帝制的运动”。③在课余，他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并“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④这时候，他结识了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当时曾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陈望道同志此时在日本“和河上肇、山川均等积极开展十月革命的宣传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热烈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⑤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五四”风暴传到日本，他立即投入在当地留日学生中引起的这一爱国运动。六月，他返回祖国。在回家乡的途中，经过杭州，受聘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员。这时，“五四”的浪潮已冲击到了浙江，陈望道在“一师”，与其他进步教员一起，配合新派校长经亨颐，响应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九月，学期一开始，他们就采取了“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首倡学生自治、职员专任、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等措施。然而，陈望道等在“一师”进行的这一系列的改革，遭到了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旧派人物在背后攻击陈望道、夏丏尊、李次九、刘大白四位进步教员为“四大金刚”，并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妄图用恐怖手段来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不久，“一师”的一位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

发表了题为《非孝》的文章，从而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省教育厅竟借故对“四大金刚”的所谓“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等骇人听闻的罪名，责令经亨颐校长予以撤职查办。这一反动措施当即遭到校长和全校师生的猛烈反对，拒不执行。反动派就出动了军警包围学校，酿成了有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次风潮得到全国的声援，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撤职查办的成命。一师风波虽平，陈望道等也不得不因此而离开学校。

陈望道同志在经过这一次斗争的锻炼和启发，然于一九一九年的年底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专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一九二〇年四、五月间，陈望道在义乌家乡，收到上海《星期评论》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前往担任编辑。他到沪后，《星期评论》即因故停刊。旋又应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时，他又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等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这之前，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这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出版了他翻译的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同年八月，他又参加筹建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同年十二月，陈独秀赴广东任职，他又负责《新青年》的工作。

陈望道同志在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编辑《新青年》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组织工会和发动工运的工作。他经常深入到沪西工人区去，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办职工补习夜校和平民女学，并亲自为这些学校上课、演讲。他还到李达主办的外国语学社授课，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同年十一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秘密出版了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起初，他也参加了这一刊物的编辑工作。为了扩大党的宣传阵地，他又通过邵力子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争取了过来。后来，他自己也担任了《觉悟》的编辑。此外，他还协助出版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在该刊上发表了《平安》、《真理底神》、《女子问题和劳动问题》、

《劳动者唯一的“靠著”》等文章。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为了配合当时的工运宣传，他发表了许多关于劳动联合的演讲和文章，并翻译了《马克思底唯物史观》、《唯物史观底解释》、《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劳动运动通论》等文章。从一九二〇年至二三年间，他还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和他自己主编的《妇女评论》副刊上，发表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倡导妇女解放和主张社会改革的文章，对推动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发展起过十分积极的影响。

陈望道在参加早期的建党活动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活动的同时，还积极从事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形成了政治与教育的交错。

一九二〇年九月起，他应邵力子的聘请前来复旦大学任教。一九二三年秋天，他又接受陈独秀的委任前往上海大学兼职。五卅运动前后，邓中夏、恽代英等因另有任务相继离去，他又接任了上海大学教务长和代理教务主任的职务。他肩负重任，率领全校师生继续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直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结束。

一九二九年大革命失败，“上大”被迫停办后，他开始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九年至三〇年期间，他又兼任复旦实验中学主任。同年，他又在地下党领导下创办了中华艺术大学，出任中华艺大校长。中华艺大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左翼文艺运动的中心场所，同时也是大学进步师生活动集会的场所。当年鲁迅曾给予中华艺大以热情的支持，曾多次应邀前往讲演。在他任职期间，举世瞩目的左联成立大会于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在这里召开。不久，中华艺大又被国民党查封了。

在这期间，陈望道一边在复旦大学等校任教，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动学生走向社会，参加革命”^⑥；一边与社会上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组织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和出版机构。与此同时，他还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活动，翻译、著述和出版了许

多有价值的学术论著，成为当时语文学术界颇有影响的一位著名的翻译家、语言、文学家。

一九二二年，陈望道同志加入了“文学研究会”，成为早期的会员之一。一九二三年，他与柳亚子、叶楚伦等组织“新南社”，提倡新文学与社会革命。一九二四年，他又与刘大白等编辑《黎明周刊》。一九二五年三月，他与叶绍钧、朱光潜、夏丏尊、朱自清等发起组织“立达学会”，发刊《立达季刊》（仅出一期）。他在《立达季刊》上发表《修辞学的中国文字观》一文。一九二六年，他又在《新女性》上发表《中国女子的觉醒》、《现代女子的苦闷问题》等文章。

由于陈望道同志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很注重运用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行教学和科学研究。他主张改革传统的以熟读和模仿为主的语文教学方法。在对于白话文的普及和提高、新文艺的发展，以及文法、修辞的研究方面，发表了许多进步的见解。他是我国最早在刊物上明确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一九二三年，他发表了《作文法讲义》，科学地阐明了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在当时的作文法著作中是独具特色的。他对美学、因明学、伦理学等都很有研究，他“因为国中没有一本简易明白的书（美学）可看”，于是就写了《美学概论》一书。以后又写了《因明学》等书。此外，他还努力介绍国外的社会科学学说和新兴的文艺理论，作为宣传新道德，发展新文学的借鉴。翻译有《艺术简论》、《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社会意识学大纲》、《苏俄文学理论》等重要著作。

一九二八年下半年，他与友人筹建了“大江书铺”，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大江书铺是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据点。以后，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由大江书铺编辑出版了他编辑的《文艺理论小丛书》和《艺术理论丛书》，发行了《大江月刊》和《文艺研究》季刊，介绍宣传科学的文艺理论，

为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因陈望道同志保护左派学生，密令加以暗害。他被迫离开了复旦大学，蛰伏在上海寓所，得以专心致志地从事《修辞学发凡》一书的写作。他有感于自古以来我国许多文人在文字修辞上化了很大功夫，却没有一部系统的著作，早在本世纪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已开始注意对修辞学的研究；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他开设了修辞学课程，编了讲义，并不断加以修订，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终于在一九三二年写成了《修辞学发凡》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这部著作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古今各种修辞现象作了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并对修辞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做了科学的论述；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保守复古的偏见，如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进行批判，理论联系实际，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的境界。

一九三二年初，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陈望道同志立即投入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国斗争。二月三日，他与鲁迅、茅盾、郁达夫、叶圣陶等四十三人发起《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二月八日，他又参加“中国作家抗日会”，并被推定为秘书长。这是一个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地下党和左翼作家很多人参加了这一组织。陈望道同志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为团结爱国知识分子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四日，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上海的中国学术界冲破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在八仙桥青年会隆重举行纪念大会。在会上，陈望道、蔡元培与李石岑等分别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和成就。这一年的二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惨死在日益嚣张的日本法西斯的酷刑下。五月十五日，陈望道同志又与郁达夫、鲁迅、茅盾、叶绍钧、洪深、杜衡、田汉、丁玲共九人发表了《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体现了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

一九三三年秋天，陈望道同志应安徽大学中文系主任周予同的聘请，前往接替方光焘“普罗文学”的教学任务。半年后又因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离职，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回到上海。这时，国民党反动派配合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白区也加紧进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一些御用文人提出了“尊孔读经”、“文言复兴”等反动语文政策。陈望道同志团结在鲁迅先生的周围，在这一年的六月，发起“大众语运动”。这个运动和文艺大众化运动一起，坚决反对和冲破敌人的这一“围剿”。“大众语运动”不仅反对提倡文言文，而且对当时白话文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进行了批判，提出白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活的口语，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展开了一场极其热烈的语文论战。在这次论战中，他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了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并和保守势力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大众语运动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给了国民党反动的语文政策以强有力的打击，也对后来拉丁化新文字的推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九三四年九月，陈望道同志在鲁迅先生的支持下，创办了《太白》半月刊。这是实践大众语的刊物，它与林语堂之流为迎合保守反动势力，鼓吹所谓“化沉痛为悠闲”的幽默小品文，提倡半文不白的语录体而创办的《论语》、《人间世》等刊物相抗衡，用尖锐的战斗的小品文去揭露和批判当时黑暗的现实。“太白”这个刊名是陈望道提出，并得到鲁迅的赞助的。它的意思就是提倡“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的大众语；同时“太白”就是“启明星”，寓意为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太白》半月刊在陈望道的主持下，战斗得很有生气，如首倡在刊物上用民间的“手头字”，创刊号上发表了胡愈之

的《怎样打倒方块字》，提倡用别字和词儿连写的办法来写文章。又如首创“科学小品”的文体，开辟“掂斤簸两”的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文，在当时是别开生面的。但是在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国民党统治下，《太白》仅战斗了整整一个年头，出了两卷廿四期就被迫停刊了。

一九三五年，《太白》被迫停刊后，陈望道同志获悉国民党又将加害于他，于是就转赴广西桂林良丰等地任教。他在良丰师专担任中国文学科主任，并兼任文艺理论与文法学的教学。在良丰期间，他与师专的师生一起创办了《月牙》刊物，紧密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办得很有生气，同时他还积极扶植和提倡话剧——这一新兴的剧种，在宣传抗日爱国方面，曾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一九三六年夏天，广西省爆发了“六一”反蒋运动。

“六一”运动原是陈济棠联合两广地方军事势力发动的抗日反蒋运动，当时师专的许多师生都投入到这一反蒋抗日运动中去。运动失败后，桂系地方军人惧怕良丰师专的民主力量进一步发展起来，遂将师专合并到广西大学。陈望道等也随之迁到了南宁。这一年的九月，抗战前夜，党在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巴金、郭沫若、茅盾、夏丏尊、鲁迅等二十一人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陈望道此时虽尚在广西，但也在宣言上签了名。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便从广西回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与韦恂、郑振铎、陈鹤琴等组织上海文化界联谊会，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在“孤岛”上继续坚持敌后斗争。他曾积极为当时的一些主要刊物《世纪风》、《文汇报》副刊《译报》、《大美报》等写稿，并热情支持《鲁迅风》这一进步刊物。他还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为动员民众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他亲自到难民所去开展普及教育的新文字宣传工作。他是上海战时语文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一九三八年，他在地下党创办的夜大学“社会科学讲习所”任课。同年七月，他又与陈

鹤琴、方光焘等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在成立会上推举陈鹤琴、陈望道为正副理事长。后来他亲自主编地下党所办报纸《每日译报》上的《语文周刊》。一九三九年，敌伪的恶势力已侵入租界，日伪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有了他的名字，但是他还在这一年的十一月份，以“上海语文教育会”的名义发起举办为期十天的“中国语文展览会”，对青年和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文字改革。这一时期他还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发表了《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的深入研究》、《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等文章，对新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他还在语文学术界发动了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次讨论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一年，历时四年之久。讨论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研究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汉语的词类区分，并由此而涉及到整个汉语文法体系的各方面。在讨论中，陈望道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从分歧到统一》等十余篇文章，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并且提出了“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严谨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的见解，可以说是这次讨论重要成果之一。这对于今天汉语的文法研究也还有现实意义。后来，他又把讨论的文章编辑成《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于一九四三年由重庆文聿出版社出版，为汉语文法学史提供了一部有价值的文献。

抗日战争爆发，陈望道同志在“孤岛”上因从事文化界救亡运动，受到汪伪特务迫害，不得已再次逃离上海。一九四〇年秋天，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夏坝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开设了修辞学和逻辑学等课程。从一九四三

年起，他开始担任了新闻系主任，直到一九五〇年七月，先后共八年，为党的新闻教育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劳动。

复旦新闻系是全国首创的一个新闻教育机构，他为了加强新闻系的建设，亲自在重庆募捐筹建了一座“新闻馆”，座落在校园的西北角上，成为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场所。系内还设有自己的通讯社——复新通讯社。在新闻教学中，他特别强调要有科学和民主的精神，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并把这四个字作为系铭。新闻系在陈望道主任的主持下办得很有生气，师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在抗战期间，复旦大学是重庆地区进步学生运动的联络中心，新闻系又是全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为此，学校当局把新闻系视为眼中钉，并不断对陈望道同志施加压力。在大礼堂的一次公开集会上，校长章益曾大骂他提倡新文字是“消灭中国文字”，是“连文字也想割据的‘亡国灭种之举’”，并扬言要把他赶走。

在重庆期间，他和地下党的同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配合地下党组织，在大后方坚持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他曾给予进步学生以支持和帮助，积极营救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的青年学生。

抗战胜利后，陈望道同志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随同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当时，复旦大学进步师生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势力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配合党的地下工作，尽力保护和支持革命的师生。他一如既往地再三要求地下党同志，把工作的意图随时告诉他，以便更自觉、更有效地协助地下党开展工作。为此，反动派曾不断地对他恐吓与威胁，并策划把他赶走。

解放前夕，他又参加了大学教授联谊会的工作，团结和组织广大教授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运动，后来，他又被推选为向南京国民党政府索取欠款的请愿代表团的代表。在上海临解放的前一天，“大教联”改选理事会，一致同意推选陈望道同志任理事会主席。六月初，大教联改组为“上海教育工作联合

会”，推选他任会长。

陈望道同志在民主革命运动及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始终站在党和人民这一边，在历次运动中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为此，国民党又将他列入黑名单，妄图再一次对他进行迫害，只由于上海迅速解放，反动派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全国解放后，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拥护和努力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竭尽全力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一九五〇年四月，他又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文化部部长；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起，他由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一九五四年，他又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高教局局长。

一九五一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在盟内担任了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一九四九年以来，他历任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他又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三、四届人民代表。

建国以来，他继续钻研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严格遵守党的组织原则，服从党的各项决议，他作风严谨，积极工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完成党交给他的所有任务。建国以来，他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在政协和民盟的活动中，为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努力改造世界观，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做了大量的工作。他还始终不懈地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统一全国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曾多次撰文向台湾广播，直到晚年在病榻上还向海外同胞呼吁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使命。

全国解放以后，陈望道同志虽已高龄及担负着繁忙的行政任务和社会活动，但他仍坚持语言科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一九五二

年以来，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新文字工作协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他为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事业不辞辛劳。一九五五年，他先后出席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努力贯彻和实践党的语文政策，在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他于一九五六年在复旦大学筹建了语言研究室，以后他又亲自主持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并积极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批评了《马氏文通》以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各种倾向，有力地批判了汉语词类区分上的意义说和形态说。为了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促进语文研究的发展，他不顾年迈与事务的繁忙，曾多次在上海语文学会和上海市高等院校作学术讲演，并于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先后到南京、杭州等地讲学，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这样一个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在他主持社联及上海语文学会工作期间，曾多次发动和组织大家对当前语言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文与道、语言和言语以及文法学科的定名等问题开展了讨论，繁荣了学术、活跃了空气。

一九五七年，“中国语文”杂志社重印了由他编辑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出版时他为该书写了《重印后记》。又曾于一九五八年与一九六二年两次重印了《修辞学发凡》。

一九六一年，舒新城逝世以后，他继任修订《辞海》总主编的职务，为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经过了四年的辛勤劳动，《辞海》（未定稿）于一九六五年出版；他还为书名题了字。

解放三十年来，他曾两次出国访问，一次是在一九五六年秋天，他率领我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

参加东德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五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另一次是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他率领人大代表团赴越南考察访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望道同志就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到一九七二年，才重新出任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时，他已是八十多岁，又患有多种疾病，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工作。在他的强烈要求下，一九七二年语言研究室得以部分恢复。在这以后他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等论文。接着，又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一书。在修订过程中，受到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对此他非常不满。一九七三年，他在为复旦大学团委、学生会举办的书法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不仅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这也是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抗议。

一九七五年十月，陈望道同志的病情加重，但他在医院里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校工作，还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顽强精神。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陈望道同志病情突然恶化，经多方医治无效，于十月二十九日凌晨逝世，终年八十七岁。

注

①至⑥均引陈望道于一九五二年填写的履历表。

